

福建百城印务局在南平

吴 更

抗日战争期间，东南沿海沦于敌手，南平成了沿海前线的后方，各企事业单位纷纷内迁。百城印务局是内迁单位中较有作为的企业之一，它在南平的时间虽短，由于印制过“百城版孙中山像邮票”和钞票等有价值证券，使该局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企业之一。

*

百城印务局以经理黄百城的名字命名。黄百城别号建昌，浙江省黄岩人，生于1899年，上海商科学校二十年代初期毕业生，后留学日本。民国十五年一月（1926年）百城印务局创办于福州古楼前之榕树巷，后因规模扩大，凡三迁，定址于福州中选街（现福州第三印刷厂）。日寇进逼福州前夕，迁往南平县大北门坊路27号（现址在建阳地区南平招待所内）营业，于民国二十七年七月（1938年）在南平正式开工。百城印务局在南平得到较大发展，进入极盛时期，从而闻名全国。抗战胜利后，该局于1945年底开始迁回福州中选街，一些不重要且难以搬迁的设备则委托互助工林承恩（福州人）留延代管。解放前夕，百城印务局又搬往台湾，黄百城本人于1949年8月15日赴台，嘱其表兄弟王连富留榕代管剩余产业。

*

百城印务局于民国三十二年二月中旬（1943年）经国民政府经济

部核准注册，登记证号数为工字第二八三三号。该局属于民营性质的企业，独立资本额为一百零七万三千四百三十八元九角。固定资金国币二百五十万元，流动资金一百万元。该局主要机械设备有：日本产胶版机一台（价值1万元）、上海产凸版机六台、上海产凹版机二十八台、铅印机十二台、石印机五台、电机石印机两台、四汽缸引曳机一台、马达四台、发电机六台、裁纸机三台、轧光机一台、打孔机二十台、木炭发动机两台、卡车一辆、消防用唧筒两支、化学灭火器两支、消防用水桶十担、电话一台，电话号码433号。另有防空洞两座。

*

百城印务局在福州、重庆、上海设办事处或通讯处，业务范围面向全国。浙江省碧湖造纸厂系该局的下属企业，其生产的纸运至南平供印刷用。福州苍霞洲维新印刷所内迁时，曾将设备搬至该局，攀附其下，为其印刷钞票及其他有价证券号码。

其重要生产原料多来自上海，上海沦陷后，原料来源较紧张，多次因此而停工待料。曾一度就近采购临近地区纸厂的仿造道林纸和仿造宣纸以应急用。兹将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主要生产原料列表如下：

种 类	全 年 使 用 数	价 值	备 注
油 类	5892斤	96833.31元	
布 类	26204尺	231496.57元	
纸 类	2471令	2040907.33元	
墨 类	13471磅	1395551.52元	
炭 类	4708担	180640.30元	
什 类		217998.77元	
合 计		4163427.80元	档案材料误为： 4163426.80元

*

百城印务局主要印刷钞票、邮票、印花税票、礼票、本票（一种类似活期存折的凭证）、支票簿、货物专卖凭证等各种有价证券。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百城版孙中山像邮票”、中央银行一百元面值和伍拾元面值的钞票以及福建省银行各种面值的钞票。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三月该局的生产能力为：日夜开足时，凸版每日可印四万八千张、凹版每日可印二万八千张、胶版每日可印一万四千张、石印电机每日可印一万张。兹将该局1942年部分印刷情况列表如下：

印 刷 品 名 称	月平均产量	月平均价值
福建省银行五角辅币券	764000张	9397.20元
福建省银行二角辅币券	1216200张	14946.96元
中央银行五十元券	1250000张	722812.50元
邮政总局邮票（凹版）	69100张	69100.00元
福建区税务局棉纱棉织品统税印花照	2000本	2000.00元
福建区税务局三角货物统税印花	55000张	38500.00元
福建区税务局一角货物统税印花	35000张	17500.00元
火柴专卖证	2500000枚	67175.00元
建华火柴厂火柴标	17.898令	1926.62元
民生火柴厂火柴标	16.475令	1630.75元

1943年除继续承印上述有价证券外，尚承印大量中央银行一百元券、邮政总局凸版邮票、印花税票、闽赣食糖专卖局纸卷烟专卖证和雪茄专卖证、农民银行支票簿等有价证券。

*

百城印务局曾两度印刷“孙中山像邮票”，版铭为“福建百城印

务局”，一向为国内外集邮家所珍视。

1942年9月，邮政总局考虑到各地物价持续上涨，原中信版（指1941年重庆中央信托局印制的普通邮票）因面值偏低，不能适应邮资随物价上涨的形势，于是即时特约百城印务局仿用香港中华版邮票的版模、印制高面值普通邮票分发各邮区使用，同时也解决闽、浙、赣、粤四省国统区的票源问题。第一次印制的邮票名为“孙中山像百城一版邮票”或“孙中山像百城凹版邮票”。该票在《中国的邮票》一书中编为“普通邮票第27套”。全套共19枚，画面为着中山装的孙中山正面像，其印刷情况见表（第五页）：

该票1942年印刷数量为69100张，于1942年底正式发行使用。1943年又印179261000张。

百城凹版票的面值全系元数票，在印刷上一概为单色印制，而香港中华版的元数票，全部是双色套印。百城凹版邮票虽仿用香港中华版邮票的版模，但因刷色有如此明显不同，两种版别所印出的邮票之区别也就显而易见了。

1943年中华邮总考虑到新疆物价与内地不同，曾将一批百城凹版票加盖“限新省贴用”字样，改值后在新疆发行使用。因此，百城凹版邮票又析出编号为“普新12孙中山像百城一版‘限新省贴用’”的另一分支。

百城印务局第二次印制的邮票名为“孙中山像百城二版邮票”或“孙中山像百城凸版邮票”，该票在《中国的邮票》一书中编为普通邮票第32套，全套共15枚。该票画面为着西服的孙中山正面像，印版由重庆中央信托局印制处制备后，通过敌伪封锁线送至南平，由百城

印务局用凸版印制。其印制情况如下表：

面值	2 元	3 角	1 元	2 元	2 元	2 元	3 元	4 元	5 元	6 元	10元	20元	50元	70元	100元
颜色	绿	棕	橄绿 (绿)	棕	蓝绿 (蓝)	绿 (墨绿)	黄	紫 (棕)	深红 (红)	蓝	棕	蓝	灰绿 (蓝)	酱紫 (棕)	棕
齿孔	无齿	12 度 齿 孔													
纸 质 以宣 纸为 主	中国道 林纸 外国纲 纹道林 纸 (紫棕)	外国纲 纹道林 纸 外国有 条纹纸	中国道 林纸 外国纲 纹道林 纸 外国光 道林纸 外国薄 道林纸		外国有 条纹纸 外国纲 纹道林 纸	中国道 林纸 外国纲 纹道林 纸 外国薄 道林纸	外国纲 纹道林 纸		外国光 道林纸 外国薄 道林纸						

另有白纸印的5元票一种。该版邮票原以进口的纲纹道林纸、薄道林纸、光道林纸印制。因战火影响交通运输，又改用连城和古田造纸厂生产的仿造道林纸和仿造宣纸印制。当时钱希清先生曾对这些情况有专文谈及。《马氏图鉴》曾把百城凸版邮票按纸质和齿孔等因素细分为27种版别。

百城凸版邮票的版模，因系中央信托局印制处代制，所以其票面图案与中信版的图案相同，其细微差别是：百城凸版的白日徽左下方有个极小的字母“C”（阴文），而中信版邮票没有这种暗记。“C”是“城”字的旧式拼音字母的缩写。此外，中信版的最高面值是5元，百城凸版在5元以上还有6种面值，最高额为100元，其区别可谓是显而易见。

该票1943年印刷量为20000000张。印毕，邮政总局派专员来南平接收。专员住在当时南平最豪华的宾馆中南旅运社内（系省建设局官办，现址在地专礼堂）。1944年——1946年该票就近分发给闽、浙、赣、粤四省使用。

面值(元)	4	5	10	20	20	30	40	50	100	5	10	50	5
颜色	蓝	灰紫	棕 (棕红)	绿 (蓝绿)	红 (玫红)	青莲 (紫)	玫红 (红)	蓝	深棕 (棕)	灰蓝 (紫)	棕	蓝	蓝
齿孔情况	12 $\frac{1}{2}$ —13 度齿	13 $\frac{1}{2}$ —13 度齿	13 $\frac{1}{2}$ —13 度齿 ☆	13 $\frac{1}{2}$ —13 度齿 ☆	13 $\frac{1}{2}$ —13 度齿 ☆	13 $\frac{1}{2}$ —13 度齿 ☆	13 $\frac{1}{2}$ —13 度齿 ☆	13 $\frac{1}{2}$ —13 度齿 ☆	13 $\frac{1}{2}$ —13 度齿 ☆	点线齿	点线齿	点线齿	圆孔齿 与点线 齿混合

①该票的刷色各工书很不一致，带括号的系出自《实用集邮辞典》一书所标的颜色。下表同此，不另注。

备注：②带☆号的七枚系另一批无齿孔邮票，属该票的另一分支。因付印初期来不及打孔即行发售所致。

1946年以后，随着物价上涨，邮资提高，急需更高面值的邮票，便将一批百城凸版邮票送至上海永宁加盖方框“国币×圆”字样，这便成为闻名遐迩的上海第二次“永宁加盖邮票”，其详情如下表：

票 号	版 别	颜 色	面 值	改 作
国 改 67	百 城 凸	墨 绿	二 元	一 千 元
国 改 68	百 城 凸	棕	二 元	一 千 元
国 改 69	百 城 凸	蓝	二 元	一 千 元
国 改 71	百 城 凸	深 红	五 元	二 千 元

其后，该票又有长框“改作×圆”及“金圆×圆”等改值变动情况。1947年另有上海大业印刷公司黑色加盖“国币”票。1948年11月起又有2枚百城版邮票加盖“限台湾贴用”字样，改值后在台湾发行使用。此改值票编号为“普台12”。

由于历史的种种因素，使百城版邮票分类众多，且变化较大。而这些分类和变化又是在有限的印刷数量范围内产生出来的，从印刷数量上来说，是较少的。物以希为贵，这在客观上使得百城版孙中山像邮票变得更加珍贵了。

有关百城版孙中山像邮票，《国邮图鉴》和1946年版马任全编的《国邮手册》中亦有详细介绍。

*

百城印务局由经理、副经理总其事，下设文书股、总务股、人事股、业务股、工务股、会计室等。工务股下设制版、印刷、装订三个组。印刷又分凹版部和凸版部。每台凹版印刷机一般由5—6人管理：师傅1人负责打版、技工1人负责揩墨，学徒1人负责把纸、粗工1人负

责手工摇机器、女工1—2人负责看票等事。

该局因印刷业务的需要，随时聘用或解雇工作人员，其在职人数难以精确统计，据民国三十五年四月南平县已登记工厂调查表，该厂有职员40人（包括技术员练习生）、工人340人。现将有代表性的部分人员列简表如下：

黄百城 经 理 现居台湾，前年在日本书法比赛中曾获奖。

陈渭文 副经理 理工毕业

林柏钦 庶 务 福州人

卢莲荪 业 务 浙江人

林益生 驾驶员

林开宗 办事员 永泰人 1941年2月参加工作

梁健志(启荣)文化通讯员 林森县(闽侯)人，国立第一侨师毕业

邱振彬 办事员 闽侯人 1941年1月参加工作

黄际华 办事员 永泰人 1941年8月参加工作

林贞祥 通信员 闽侯人 1941年3月仅13岁参加工作

张宗昌 办事员 永泰人 1940年12月参加工作

徐维汉 印 刷 浙江人 原福州印刷厂厂长，现已离休

（另有70余名职工花名册，今从略）

*

百城印务局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学徒则要提早10几分钟上班，生火炉烤墨和清洁机器，为上班作准备。除了定时外，该局还实行定额生产，按不同机种制定不同定额（即八开印刷机印八开纸规格、四开印刷机印四开纸规格、对开印刷机印对开纸规格），于是定出印500—1100张算一工的定额范围。该局对聘请来的北方师傅较为照顾，其生

产定额数一般比本局一手培养的工人师傅的定额为低。该局的生产定额订定得很活，遇到印刷任务紧张时，便请工人师傅加班印刷，其定额则相应减少一些。以印500张记一工的定额为例，凡印完800张则记二工，印完1000张则记三工。这种管理方法，调动了工人加班印刷的积极性。

*

百城印务局有严密的规章制度。大门口和总车间门口各设一名黑衣警察站岗，但不搜身。闽南人倪剑秋曾任门警。为了便于考勤，该局一度实行进门卡片制度。工人上班时应将自己的卡片投入考勤箱，经记工员登记后再把卡片送至车间当面发还给各工人。此种方法，实际上等于考勤两次了。

印刷邮票和钞票等有价值证券时，甲方都派有监印驻厂监督印刷。中央信托局特约督印员名叫任德勋。工人早晨应到监印那里领出版模，下班时交还版模并报告印刷数量。如有废票，经监印核实后销毁。印刷钞票一般要经过浸湿、凹版印刷、凸版印刷、盖印、编号、烘干、压平、裁正、包装等好几道工序。每道工序都有严密的交接手续，双方当面点清张数，责任较分明。票边一般都附有每架机器的暗记，哪一架机器在哪一道工序发生问题，都能及时查对出来。如发现印刷数量短少等异常情况，所有经手的工人都要留下来复查，查清问题所在，才能回家。

如无特殊情况，不允许工作人员到其他车间走动，以免发生失窃或其他问题。当时日寇飞机时常来骚扰，师傅们听到警报声，便跑到防空洞躲藏。学徒们一怕完不成定额、二怕半成品丢失，只得冒险坚守工作岗位。

百城印务局所印的钞票、邮票、税票等有价值证券当时就在市面上广泛流通使用，而其工人却不敢盗窃或是弄虚作假，这不能不说明其管理制度较严密。当然，也有个别利欲薰心的工人学会了该局的印刷技术，脱离该厂后在自己家中私印假钞票。国民党报纸曾披露过四贤街的何友椿（原该局工人）私印假钞票，后被当局抓获一案。

*

黄百城系比较开明的知识分子企业家，他所经营的印务局对职工福利事业较为重视。据档案记载，在南平县各工厂企业中，数百城印务局的职工福利委员会成立最早。该局有12人经办福利事业（其中职员5人、工人7人）。1943年用于福利设施之经费计43000元，1944年福利金22500元。该局设有食堂、宿舍、浴室、理发室。工作人员的膳宿皆由局方供给（未在该食堂吃饭的，则折米发给）。两座二层楼的职工宿舍位于现消防队附近，每间房住8个工人。该局的诊疗所备有普通药品供工友使用，当年南平县卫生院医生翁清芳曾任该印务局的特约医师，每周定期前来为工作人员诊病。该局另有专职清洁工负责厂区环境卫生。

该局还有阅览室、体育场等文娱活动场所。曾请北京太极拳师傅来教工人习拳锻炼身体。业余闽剧社由职工福利委员会领导，时常排练上演闽剧节目。另据知情人士说，闽剧社亦起团结同乡工人，免受外地人欺负的作用。

另有一支青年职工歌咏队，利用午休教唱诸如《我们在太行山上》、《游击队歌》、《黄河大合唱》等革命歌曲。副经理陈渭文极力反对歌咏队的演唱活动。据说百城印务局内也有共产党员在秘密活动，该局职工福利搞得较好是工人们团结一致向当局力争才达到的。

职工因生计所需，亦可向印务局借款。借条经黄百城签批即可到会计室领款。一般数额较小的借款可不必偿还。这使得职工在感激之余能加倍努力工作。

福州沦陷期间，不少难民流离失所，部分难民辗转来到南平时，曾慕名到百城印务局诉说他们沿途逃难的艰辛，该局则造册发给每人三元之救济款。

该局一般不供给女工膳宿，而是让她们按月支领45市斤（30升）大米。该局所有在职人员的薪俸及加成并生活津贴总额一般比其它企业为高。因此，其纪律虽严、工作条件虽苦，还是有许多人愿意参加该局工作的。

该局的帐房先生每月包送学徒工的生活津贴费到家，这样一则能避免小孩不懂事把钱丢失，二则可以防止小孩沾染赌钱、抽烟等坏习气。此举颇受家长欢迎。

该局的工作人员一律应佩戴徽章。徽章系蓝底，上书百城印务局白字。徽章共分三种形状：职员、师傅等佩戴圆形的；学徒佩戴三角形的；粗工佩戴长方形的。

一些须外出探亲的工作人员，都持有该局为其出具的介绍信，证明自己的身份，使他们旅途顺利。该介绍信的落款，当印中央银行钞票时，则盖“中央信托局特约工场”的印信；当印省银行钞票时，则盖“福建省银行特约工场”的印信。

凡百城印务局的工作人员，可以免服兵役，因此许多青年都愿意来此工作。也有一些青年纯粹是为了躲壮丁，才托人情活动，钻进该局做工。当然，要进该局工作并非易事，得有三家有名望的人作保方准入内。后来，也曾降低过招工标准。

该局印刷业务清淡时，便要裁减工作人员。被裁人员每人发给三个月的津贴作为遣散费。还发给离局工作证，以利被裁人员再度在别处找到工作。

*

当年要创办如此规模的企业，没有一定的政治背景是寸步难行的。黄百城是福州商会的理事，他父亲是云霄县的县长。他与上层军界、政界、工商界头面人物交往较深。特别是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至交，与福建省主席陈仪是同乡（一说是表兄弟），所以在工作中没有什么干扰，业务能遍及全国，事业上较为顺利。

*

从百城印务局存在的历史来看，它极盛时期是在南平形成的，它是搬到南平后才向民国政府申请注册的，它的主要成就和影响也是在南平这一段历史时期内形成的。它在南平存在的时间虽然不很长，却为我国的邮票史、金融史和南平的印刷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今年正值隆重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南平人民为南平曾印制过两套孙中山像邮票而自豪。目前，黄百城已年近九旬，身在台湾，但他所创建的百城印务局却永远留在南平人民的记忆里。

1986年7月初稿于福州

8月二稿于浦城

9月定稿于南平

本文主要数据来源于南平市档案馆有关档案资料

本文主要采访者：

①福州印刷厂离休厂长 徐维汉

- ②福州印刷厂退休技工 林贞祥
- ③福州印刷厂退休干部 陈寿森
- ④浦城县汽车站退休司机 郭茂灯
- ⑤南平第一印刷厂副厂长 唐崇清
- ⑥南平市五里亭水电中学教师 宋晓文
- ⑦南平市森工机械厂干部 王克原
- ⑧南平市搬运公司书记 薛火生
- ⑨南平市交通局干部 黄金铭
- ⑩南平市饮食服务公司退休医生 翁清芳
- ⑪南平市饮食服务公司退休工人 温伯良
- ⑫南平市工商银行退休干部 庄文豪
- ⑬南平市第一印刷厂技工 黄金文

本文承陈启华老先生审阅，并提出宝贵意见，特此鸣谢

土 堡 特 产——土 纸

倪 可 成

土堡乡地处南、尤、沙交界边远山区，是个老区，属于省定贫困乡之一。全乡22万亩土地，山地就占17万亩，其中竹林地达七万多亩，为造纸提供可靠的原料，全乡十三个行政村，除陇岭、大坪两村生产黑笋干外，其余十一个行政村，均生产土纸，为全市重点产纸地区之一。

土纸又称北庄纸，主要用途是作为包装纸、卫生纸、迷信纸，原料取于毛竹。解放前及解放初期由于交通不便，林木、毛竹均靠水运，山乡河小，水大怕冲，沽水又无法流送，只有以毛竹加工土纸，既可充分利用劳力，又能解决付业生产和生活出路问题，所以当时小土纸厂就达四百多座，年产土纸均在七千多担左右，数量最多的虎山村土纸厂42座，年产土纸四千担。质量最好，声誉最高的是以石城村蔡记标号（当时盖有蔡兴明兄弟标记）重量、张数均有保证，所以销路最广，远销东南亚，在国外享有盛誉。

土纸计算方法，每担四捆，每捆六刀，每^捆刀一般32斤，重的35斤，最低也有30斤，每刀200张，这是当时土纸的质量标准。

小土纸厂多是单家独户经营，一户一厂，每厂四人，农忙务农，农闲造纸，生产设备简陋，投资少，只要一座简易厂房，内设纸焙一扇，滤纸池一个，竹帘两面（滤纸浆用）就可生产。由于设备简单投

资少，每家每户均有承受的能力。

在生产技术上主要是滤纸与焙纸，由于家庭作业，多是父传子、子传孙、代代相传，生产过程中季节性比较强，平时做好竹山管理工作，春季养护好竹笋，至立夏过十天就要上山砍青，（太早竹笋太嫩，太迟竹笋成竹太老）破篾片，捆把放入池内，上盖石灰，用水浸泡，每1500斤竹丝，用100斤石灰，每隔三四天搅动一次，使石灰水均匀成为黄色，经过浸泡两个月后，竹片拿起一根，一折就断，表明已浸烂，就可把灰水排掉，竹片捞出，用清水洗净，再放入池内，用清水漂浸，更换二三次（每隔三五天换水一次）整个过程从浸灰水与清水漂浸有八十天左右就可造纸，但在造纸前，仍应把竹片的竹青一面剥下，把竹青用水碓再碓烂，（竹白不用碓，只用人工踩成烂浆）把碓烂、踩烂的纸浆放入滤纸池内，用竹帘把浆捞起，一帘一张，贴上纸焙，烘干成纸。

一厂四人，具体分工是：踩浆一人，滤纸一人，焙纸一人，碓纸等打杂一人。

近年来，随着经济建设发展，交通条件改善，付业门路增多，机械工业发展，卫生纸、包装纸，市场上供应已为机械纸所代替，我乡石城、虎山、赤坑亦办起机制造纸厂，日产半吨至二吨，全乡纸产量并不减少，而小土纸厂（人工加工纸）大大减少，目前还不上80座。

从目前形势看，恢复土纸厂人工生产，有利条件：（一）有历史习惯技术力量；（二）投资少，个人可办易于承担；（三）家庭辅助劳力可以发挥；（四）可以发展家庭加工业增加收入。近几年来乡党委根据毛竹林垦复与护笋养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全乡七万多亩竹林已包干垦复。虎山村除办好机械造纸外，小土纸厂已恢复35座，现年

产土纸已占全乡一半多，只要全乡把小土纸恢复到三百座，那经济效益将是相当可观的。

以 匪 治 匪

国民党统治时期，樟湖坂有著匪两股（一是闽清黄其德股匪，多在农村掳掠；一是尤溪阿谟九即陈孝清股匪，沿溪包征捐税）势力最大。1930年刘卢战争结束后，驻樟之卢部队远调，地方自卫武力薄弱，掠夺农村之黄匪，认为时机已到，遂纠集了“陈德华”、“黎黎”“黑黑”三股小匪，趁民俗“祭灶”节日，化装潜入石印山巅之仙奶庙，并派探四处寻找樟湖商会长，当时被大商铺察觉，遂各借故关门设法逃避。协春号经理和广春林老板两人不幸被匪抓获。黄匪押着被抓二人，沿街挨店敲门传讯，通知各该店主应交摊派“助饷”金额及缴交期限，并大肆威胁：“如果逾期缴款，则用点灯美孚煤油，烧毁街市，把樟湖夷为平地。”弄得全镇人心惶惶，恐惧万分。

樟湖商会长陈耕餘，当即密联会员，共商对策。一致同意“以匪治匪”为上策。一面派人殷勤招待黄匪，笼络其部下；一面派人漏夜奔赴太平埔头告急，密向陈匪阿谟九求援，经陈匪允派黄排长，立刻率队出发，埋伏在金龙巷头三角埕墩路旁草丛中，约定等待民团从坂头开枪，突击黄匪，迫使徒匪由新岭撤退，混乱之际，陈匪伏兵即蜂涌而出，狙击黄匪。结果击毙匪徒十余名，匪首黄其德亦当场毙命。一场浩劫，始予荡平。众民咸感商会长机智歼匪保乡之德。

陈待秋供稿 郑亨升整理

染布摇篮——樟湖坂

陈承周 肖自勉

樟湖坂即樟湖镇，位于闽江上游，是南平市主要集镇之一，也是自福州至南平闽江两岸的最大的乡镇之一，故有樟湖大坂之称。历来是古田、尤溪邻邑商贾贸易集散地，商业颇为繁荣。各种京果、鱼货海产、百货、烟酒、糕饼食品、医药、以及手工业品、金银首饰等工艺品件件皆有，而染布业也盛行一时。

樟湖染布业大约始于清乾隆年间，距今有二百年历史。极盛时期最早有王成美、黄碗妹（上坂街）、胡阿细（坂头街），刘来成（中和街）、黄茂盛（中坂街）、胡章利（下坂街）、×哲宝（古田人）等七间染布店。民国时候减少只剩王元明取名成美染店，胡章利定名万丰染坊。解放后增加张生标、黄永平合营名为永固染坊。

樟湖集镇染布业所以能昌盛一时，主要是：（一）穿衣是人民生活首要问题，尤、古以及南平下半区人民穿衣多是原料自产、自纺、自织，染料加工尤感迫切需要。（二）成本低利润高。（三）原料来源充足可就地取材。（四）有染布技术师傅。（五）地处尤、古交界，有广大农村，农民是其基本的业务对象。樟湖坂之所以能成为闽北化工染布摇篮之地，有以下几个因素：

（一）据了解当时染布业成本低利润高。成本三成而利润七成。古有云：“一酒缸、二染缸、三当店、四盐仓”。说明其时染布业利